



《近世文史随笔选粹丛书》



(清) 汪康年 著 匡淑红 编选、校点



穰卿随笔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PDG

《近世文史随笔选粹丛书》前言

尽管“随笔”一词，迟至南宋·洪迈《容斋随笔》方才出现，并用为书名，但这种体裁却古已有之，先秦诸子著作中的许多篇章，其实就是后世所谓之“随笔”。非只此也，就连号为经典的《论语》、《孟子》等，又何尝不是后世所谓的“随笔”？

为什么随笔一体如此源远流长，虽历数千年，迄为著述家与读者所钟爱？

说来，其因不外：

一是随笔之“散”。所谓“散”，系相对于历史上曾代兴之“韵文”（如楚辞、汉赋之类）、“骈文”（即所谓“四六文”）等而言。因其属于“散文”，故无固定之程式和法则，执笔者可享充分之自由，无所拘束，“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且其形式一般不为时代风尚所左右。

二是随笔之“随”。即主题不限，内容不拘，可庄、可谐、可大、可小，随所感、所闻、所见，皆得直抒胸臆，信笔书之，若话家常。不必有系统，更无须顾及全书之结构，即使是“东一榔头，西一棒锤”，亦不致见

讥于人，谓非著述之体。

三是随笔之“短”。凡号为随笔者，篇幅皆有限，一般均以简明扼要取胜，即便阅读，又利于内容之浓缩。以同等篇幅论，则“随笔”读来省时，且所包含之信息量相对为大，为丰，使读者得事半功倍之效，获开卷有益之实惠。

四是随笔之“松”。随笔所含，较少庄严凝重之内容，其题材多相对轻松活泼，或属人生之体味，或属故典之探究，或属社会之新闻，或属闻人之逸事，或属谈诗论文，或属研艺述珍……总之，一般多具趣味，分别以哲理性、知识性，予读者以多层面之启发，既有裨见闻，亦足资谈助。无艰于阅读之劳苦，有品味高尚之收获。犹之轻音乐之可令人愉悦、放松，享消闲遣兴之乐。

这散、随、短、松四字，既为随笔之长，相对亦为其短。散，或致缺乏义蕴、文采；随，或流为冗琐丛脞；短，或易偏而难全；松，或失诸肤浅庸俗。“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惟在执笔者之善于驾驭。名家与恶道、杰出与庸俗，亦由而别之。实例具在，不必深论。

需要指出的是：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和世代著述家的努力，“随笔”这块园地已是流派纷呈，争奇斗妍。

有的侧重于议论感悟，有的侧重于掌故珍闻，有的侧重于谈文论艺，有的侧重于搜奇列异，有的侧重于抒发感情，有的侧重于研究学术，有的侧重于描绘故事，有的兼而有之……此系就内容而言。至于在写法上，或

致力于艺术渲染，或致力于本色写实，或致力于单线白描，或致力于浓墨重采，或综而合之……亦各有独到。

这种不同风格与特色的形成，既基于著者之学养与情趣，更决于著者的造诣与功力。“孙猴、八戒，各有所爱”，读者尽可自择所尚，初不必有所轩輊。

说到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笔记”与“随笔”。脱开现代文艺学的范畴，就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人们习称之“笔记”，当然属于“随笔”，但却不能等同于“随笔”。

盖“随笔”，即洪迈所谓“意之所之，随即记录，因其后先，无复詮次”者也，故其范围更宽，更广，除习称之“笔记”外，诸凡非专著性，而系零篇短什之野史、稗乘、书事、纪闻、传人、述感、序跋、题识、游记、日记、语录、书札等等，皆可归之于“随笔”。

本丛书之取名“随笔”，意在示其包罗对象不仅仅限于习称之“笔记”。

同理，本丛书所谓之“近世”，亦不尽同于习用作历史分期之“近代”。

今中国历史，以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为“近代”，“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现代”；世界历史之分期，则非但说法各异，且无一与中国历史分期吻合者。本丛书仅取其相通者为参照，而用“近世”一词之古义，即《荀子·非相》篇所谓“远举则病繆，近世则病佣”的“近世”，意谓去今不远之时世。

具体说，系指自清中叶即鸦片战争前数十年（十九世纪初），以迄 1949 年。如此划分的目的有二：一是想把鸦片战争前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包括进来；二是由于从鸦片战争到建国前，中国的社会性质其实并无本质的不同。

持此为范围，凡生活于其间之文史随笔作家，纪述其间事实之文史随笔作品，皆在搜罗与发掘之列。当然，其中之记述内容多有上及清初，甚或更早者，但须以记上述“近世”者为主；其中作家之生活年代，或有其生早于十九世纪初，或有其卒已为建国之后者，但其主要文史随笔著作的产生及其成名，则应系上述“近世”之事。

至于本丛书之于“随笔”前特冠“文史”二字，是想稍稍限定范围，即将专门属于美文、专门抒发情感、专门探讨哲理、专门从事议论、专门搜奇列异、专门研治“经学”的一些“随笔”除外，力避虚空、繁琐和过于艰深。

所收罗者，侧重习指之“文史”，即文化与历史，以掌故性、知识性和启发性，使读者于可读耐赏、广知博闻、明目醒脾之余，对近世文史随笔作家及其著作有所认识与了解，聊充深入探究之津逮。

丛书名称中之“选粹”二字，既体现了编辑的宗旨，也标明了编辑的方法。

“选粹”者，择其精华也，撷其纲要也，提供读者

以经过挑剔、加工之精神食粮也。近世文史随笔著作虽然相当丰富，但内容亦颇驳杂、参差。本丛书既定位于一般文史爱好者和有兴趣于广知博闻，汲取有益之精神营养的读者，而非专门研究者，自然不必无别优劣，不分精华与糟粕地全文照印，徒费读者的宝贵时间和本可他用的纸墨。因而，“选粹”便成为必要。

且惟有“选粹”，方符“批判地继承”旧时精神产品的正确方针；惟有“选粹”才能更好地实现“便于读者认识近世历史文化社会，了解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鉴往励今，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编辑宗旨。

选粹，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在众多作家中“选粹”，一是在该家众多作品中“选粹”。也就是把优秀作家和他的优秀作品发掘出来，经过加工，贡献于读者。虽系尝鼎一脔，但足可由而略窥全盘。

其间，在每辑所收八家中，适当注意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时期作家的搭配，以免单调。由于限定每位作家一册，故其随笔著作之总篇幅未超过二十万字，致无“选粹”余地者，则只好割爱。

具体操作中，则根据诸家作品的实际，以“四性”、“六不取”为原则。

四性，谓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史料性。

六不取为：过于深奥，为今日一般读者所隔膜者，不取；攻击、污蔑、歪曲农民起义者，不取；丑化、歧视兄弟民族者，不取；宣扬宗教、迷信者，不取；低级

趣味或格调不高者，不取；与时代潮流、现行政令抵触（如宣扬早婚、纳妾、多子多福、嘲诋火葬之类）者，不取。

需加说明的是“六不取”所指为内容主旨，非指个别词句。若称农民起义为“匪”、“逆”之类，不必因有此类词句而概弃之，相信读者自会鉴别。余可类推。

至于因时代与阶级地位限制，在观察的准确，立论的允当，记述的严谨方面，原文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欠缺，自然未可苛求，于此不必细说。

由于近世文史随笔著作，多采用比较浅显的近世文言文，用繁体字，或无标点，或仅有断句，且在称谓习惯、书写格式等方面，亦与今不尽相同，不便今日一般读者阅读，加之所据底本，难免抄印之讹误，所以必作相应之加工。但这加工，非谓修改或删节原文，而系在保存原文的基础上进行。

具体包括十二项：

一、校订文字，对原本抄写、刊印之讹误，在理由充分、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采取径改法，不另说明；对属于疑似之间，无确切把握者，则姑仍其旧，不擅为更动。原文中以□□□隐去其名者，一律仍旧。个别无从辨识之字，亦以墨框示之。

二、改为简化字，统一异体字，加现行标点符号，横排。

三、凡于兄弟民族名称加“犬”旁之类，意存污辱

者，统回改为该兄弟民族之本称。

四、除原无条目标题者，概为新拟条目外，原有者亦视情况，或保留，或重拟，并于导言中说明。

五、对行文中使用字、号、别署，以及以谥为称、以籍为称、以爵为称、以官为称者，统于新拟标题中列出该人之姓名。

六、对因未取其前之具名条，而所选条又中脱姓、脱名、脱年号、脱地名者，一律补于文中之相关部位，并附〔 〕以别之。

七、原文中之小字夹注，则改为同号楷体字，加（ ）以别之。个别或仅以不同字体区别之。

八、原文过长者，酌为分段。或撷取其中有关部分，单独立条。惟均保持原文完整，中不删节。

九、每册依内容性质，或依来源，分为若干类，并拟类目；类下之条文，依符合逻辑之原则排列，不尽依原书。

十、每条末，注明来源、出处，以便复按。个别或取统一说明法，不一一具列。

十一、书首统加以《×××（该书著者）和他的随笔》为题之导读专文，介绍著者及其随笔，说明选编中之有关事项。

十二、书末统附有关该著者的碑传资料，及其随笔著作的叙录资料。

如此加工的目的只有一个：便于读者的阅读与了

解，尽量减少阅读与了解的“拦路虎”。

因系经过抉择、加工之新编，故统以该作家之字、号，后赘“随笔”二字为各该册之书名。计划以每辑八册，分辑陆续编印。

尽管旨在为读者献上一套经过选择与加工的雅俗共赏、品位高尚的文史读物，立意正大，将事认真，但是否符合读者口味，特别是上述选粹原则与加工方法之是否有当，均有待于读者来审查与鉴定。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不惮风险，勇于组织编印这套效益尚未敢必的丛书，尤足征其识见与魄力。作为选编者的我们，更殷切期望得到方家与读者的批评、指正。

1997年溽暑，姜纬堂谨识于京华两知二有之斋，时年花甲有二。

汪康年和他的随笔

姜 纬 堂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穰卿随笔》，是清末著名爱国报人、维新活动家汪康年随笔著作的选集。

汪氏原名灏年，字梁卿，十九岁始更名康年，字穰卿，中年号毅伯，晚又号恢伯。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生于咸丰十年正月初三日（1860年2月4日）。

钱塘汪氏，先以业盐及经营当业致巨富，鼎盛于乾隆年间。康熙末年，汪宪成进士，始以科名著。其后，代有人才继起，蔚为文化世家。以献藏书而获清高宗明令嘉奖之汪汝璥；以著述繁富，广接海内名流而著称之迂远孙，皆其表表。汪氏振绮堂藏书之美富，尤著名于世。

至康年出世时，汪氏家道早已中落。又逢太平天国进军浙江，烽火连年，康年乃生于避乱之客旅中。至四岁时，方因其父捐赈宦粤，举家移居广东，稍得安居。惟因其父浮沉下吏，生活时见蝼蛄，故康年实于艰难条件下读书向学，成长起来。十九岁，始回籍应试。二十四岁，因父已故而举家返杭，赖教馆及充书局分校为生。

光绪十五年（1889年），乡试中举，时年三十岁。次年，入京会试，落第。以名举人，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招，赴武昌，教张孙读书，旋充自强书院编辑、两湖书院分教。光绪十八年（1892年），再应会试，中式第二十七名，因疾未应殿试而返鄂。光绪二十年（1894年），补应殿试，列三甲，成进士，仍返鄂。时年三十五岁。连番入京，得结识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之士，上下议论，多所共鸣。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士论沸腾，因而有强学会之成立于京师。汪氏在鄂，既与京中通声气，又发起中国公会于当地。旋应康有为之召，举家移沪，主持强学会事，积极投入维新运动。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汪氏以被强令停办之强学会余款，在沪创刊《时务报》。该报月出三册，核心为政论。由汪任经理，梁启超等先后任主笔，积极鼓吹维新变法，系维新派最具影响的舆论阵地。汪之《中国自强策》、《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等，即刊于该报。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1898年5月5日），又于《时务报》外，别创《时务日报》，首家采取西文报形式，以白报纸双面印，分版、分栏，文加句读。汪任主编。标明宗旨为“转圜时务，广牖见闻”，“重在采译西报”。实际是以日报形式，配合每旬一刊之《时务报》，相辅相成。

其间，汪氏以报纸为依托，大力组织编译新学书籍，除成而未及付印之七种、正在编译中之九种外，付印者共九种，在当时颇有影响，被推为有用之书。更发起创办肄习日文的“东文学社”、研究儿童教育的“蒙学公会”、提倡改革妇女缠足陋习的“戒缠足会”；赞助成立女学堂、务农会。在维新风俗，改良社会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努力。至于依托报馆，广事联络，发现并向有关方面推荐实学人才，和为各地读者代办事务等，同样是对报馆影响的恢拓。

在光绪二十四（1898年）的“戊戌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于六月初八日（7月26日）降谕：“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汪氏即于六月二十日（8月7日）《时务报》出至六十九期后，以既“奉上谕”，“是‘时务’二字，断非草野所可妄用”为由，自七月初一日（8月17日）起，更《时务报》为《昌言报》、改《时务日报》为《中外日报》，照常出版。

此举之实质，在二报主权之谁属。由而掀起不小的波澜，也暴露了汪氏先是与梁、现又与康的分野。旋因慈禧再出训政，废黜百日维新，康、梁出走，双方之公开争论，方不了了之。在慈禧严令查禁报馆、捉拿主笔声中，《昌言报》尽管声明汪已离职，也还是在十月初六日（11月19日）出第十期后，自动停刊。《中外日报》则由于自八月二十九日（10月14日）起，改挂英商招牌，由英侨出名任经理，而躲过查封，仍在汪氏实

际主持下继续出版。

庚子（1900年）后，面对列强瓜分的威胁，汪氏尤着意于救亡图存的宣传。在慈禧玩弄假维新骗局的新形势下，汪氏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入京，补应朝考，授职内阁中书。时年四十五岁。自此，往来京、沪，一面继续主持《中外日报》，一面谋画在京办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被委为学部二等咨议官。次年三月十六日（1907年3月28日），在京创刊《京报》，宗旨为：“合同志，结团体，力纠政府之过失，以弭目前之祸。”流报系日刊，大报，以“伉直敢言”，著声于时。终因系列报道、评论因“杨翠喜案”揭出之庆王父子丑闻，于七月十八日（8月26日）被民政部勒令停刊。

雪上加霜的是，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四日（1908年8月10日），又被迫将苦心撑持近十年之《中外日报》全部产权，出让与苏松太兵备道蔡乃煌，变为官办报。但汪氏痴心不改，先于宣统元年（1909年）重新组织海外通讯社“远东通信社”，继于宣统二年十月初一日（1910年11月2日），在京创刊（刍言报）。

该报为五日刊，“以评论及记载旧闻，供人研究为主，不以登载新闻为职志”，“间将前数日各报所登最重要及最刺心目之事，摘要登载，以资警告”。被时人推为独辟蹊径，而集撰著、编辑、校对、发行于汪氏一身，亦其特点。其间，汪氏对时政、世象、流风乃至报

风，均发表了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爱国济世之怀，跃然纸上。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六日（1911年10月17日），《刍言报》出最末一期后，即因汪氏久病缠身，不克执笔而自动停刊。九月十三日（11月3日），因辛亥革命爆发，京师骚然，而避居天津之汪氏，逝于客寓。终年五十二岁。

除生前编刊之《振绮堂丛书》初、二集，凡古今著述二十四种外，尚有已编而未及付刊者三十一一种。此前尚曾单独刊印数种。所著论说之载于《时务报》、《京报》、《刍言报》者，经其弟诒年辑印为《汪穰卿遗著》八卷，于1920年付印。其札记朝政国故，闾巷琐闻，艺文轶事之文，诒年别辑为《汪穰卿笔记》八卷，于1926年付印，其中大半已载于《刍言报》，小半为首次刊出。

本书即选自《汪穰卿遗著》卷七、卷八及《汪穰卿笔记》卷一至卷七。《遗著》所载，原皆于文末附注见于《刍言报》之期号，今从略。《笔记》原标卷一为《纪事》，乃篇幅较长者；卷二至卷六为《杂记》；卷七为《雅言录》，以“纪载新旧书籍之存佚、源流，兼及书画、碑牌”者归之。二书中，除《笔记》之《纪事》卷诸文，原有标题外（今选其五则，载于《漫记》之首），余均无标题，今统为新拟。其原有标题者，个别亦稍为精炼。

全书依内容，分为《杂感》、《漫记》、《志异》、《笑林》、《谈故》、《谐喻》、《人物》、《艺文》等九类。原仅有圈句，今统改为今式标点。文中以“校者按”引首之附注，为汪诒年所加，统随文保留。又有个别因系时人，而以方框隐去名字者，今仍旧，惟于新拟标题中列出其名，如页232之江绍铨。

《附录》所列参考资料，除首篇外，皆民国初年之作，观点方面容或可议，谨请读者注意；个别篇末署年月括注之公元，为今加。

从本书所选，不难了解汪氏随笔的特点：一是思想锐敏，善于因小见大，由乌及屋；二是态度冷静客观，分析周密，说理性强；三是短小精悍，文笔简炼、老到；四是学养深厚，此在“谈故”及“艺文”部分，尤其突出。而所纪皆系亲闻、亲见，甚或实历，尤其独具之价值。“欲考清末之政治及其社会之情状者，此殆其渊藪矣”。汪诒年此评，当非阿好而夸。

尽管作者除维新变法运动初期外，向不主张激烈，晚年尤反对革命行动，但其爱国情怀，其为启牖新知，所作的有内容与有力量的鼓吹，殊属可取。他对新旧转换期中许多社会现象的针砭，至今依然不无启发。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我们才推出此书，期与读者共赏。

目 次

《近世文史随笔选粹丛书》前言 姜纬堂(1)

汪康年和他的随笔 姜纬堂(1)

杂 感

- | | |
|-----------------|-------------------|
| 愈逼愈紧..... (3) | 称谓名词宜考究 ... (9) |
| 彼何为者..... (3) | 标名可虑 (10) |
| 教主之来..... (4) | 事当晓谕 (11) |
| 国力亦有行市..... (4) | 豪杰 (11) |
| 存亡之道..... (5) | 用人 (11) |
| 彼相持始利我..... (5) | 今日人才 (12) |
| 租界非桃源..... (6) | 教猱升木 (12) |
| 验疫..... (6) | 至要至切之事 (13) |
| 美将导淮..... (7) | 官不得置办产业 ... (13) |
| 非民之咎..... (7) | 制俸宜定起率 (14) |
| 视之有愧..... (8) | 捐款酬官 (14) |
| 使馆界非租界..... (8) | 引退难 (15) |
| 名目不可忽..... (9) | 自行托印 (15) |

不可解	(15)	又多阻碍	(28)
游民	(16)	封禁《公论实报》 ..	(28)
国丧禁戏	(16)	联络报馆	(29)
知要之言	(17)	利用报馆	(29)
自强之道	(18)	天空人之报	(30)
析断瓶	(18)	报贵记实	(30)
银行流产	(19)	报道宜慎	(31)
某银行	(20)	虚多实少之故	(31)
有否布置	(20)	西洋鼓吹	(32)
极关经济之二事 ..	(20)	慎加劣名	(33)
摊派之非	(21)	舍本事末	(33)
派销官报	(21)	控诉	(34)
彩票济亏	(22)	空论	(35)
罢市风潮	(22)	实可不登	(35)
冒名应防	(23)	不知被诟	(36)
厕名董事	(23)	谣言	(37)
断指抗议	(24)	外国亦有臭虫	(37)
妄比富	(24)	是非依傍外人	(38)
须知阡限	(25)	盲从	(39)
事当别论	(26)	奇谈	(40)
滥参外交	(26)	旧名安能尽革	(41)
淡淡著笔可矣	(27)	蹈袭	(41)
忧	(27)	以便利为转移	(42)
徒费工夫	(27)	公道	(43)